

黄寿成 著

# 《隋经籍志考证》

## 及其王颂蔚批校研究

會稽章宗源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838

29

黄寿祺·著

# 《隋经籍志考证》

## 及其王頌蔚批校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隋经籍志考证》及其王颂蔚批校研究 / 黄寿成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 - 7 - 5161 - 4669 - 9

I. ①隋… II. ①黄… III. ①古籍—图书目录—研究—中国—  
隋代 IV. ①Z8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86105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宋燕鹏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李寡寡

---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8  
插 页 2  
字 数 473 千字  
定 价 88.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自序

本书是我出版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因此我以为有必要将自己的求学之路略作叙述。

我的求学道路可以说是有些坎坷的。我虽然自幼就生长于史学世家，但是初入小学不久即逢“文革”爆发，直至中学毕业，那时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无缘进入高等院校进行系统的学习。不过幸运的是，在进入中学后，先父黄永年教授就有意在史学方面引导我，给我购买了中国近代史中有关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义和团、辛亥革命的通俗读物，供我阅读，培养了我的史学爱好和兴趣。

记得后来他老人家还命我阅读宋人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清人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等传世文献以及著名明清史专家谢国桢先生《南明史略》等名家著述，还在版本目录学方面对我多加指教，让我见识了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和清人纪昀主持编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些都为我以后从事历史研究及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中学毕业之时，虽然大学已经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可是那时“文革”尚未结束，大学之门对于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狗崽子”是关闭的。当时我们这一代人，大多只有上山下乡这一条路，好在当时国家出台了独苗不用下乡的所谓“免下”政策，于是我就进了工厂，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一年多以后“文革”结束，随后又恢复了高考制度，我们这些人也有机会参加高考，可是由于我当时畏于先父因言招祸之鉴，没敢报考文科，结果屡屡受挫。

此后几经周折，直至1994年才考上了陕西师范大学的隋唐史的硕士研究生，师从民族史专家马驰教授，才算正式进入学术的门墙，1997年毕业后留校在历史系任教。此后深感学识的欠缺，于是在2002年又开始攻读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师从贾二强教授。可是由于种种原

因，我的博士毕业论文并未撰写研究历史文献学方面的学术课题。

而这部著述的写作又实在是有些偶然的。三年前在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任教的曹旅宁教授与我谈起先父曾收藏有一部清光绪三年（1877年）由湖北崇文书局刊刻的乾嘉时期学者章宗源所撰写的《隋经籍志考证》，清末被誉为“苏州四才子”的王颂蔚还在书中做了大量的批校，并说起北京大学辛德勇教授对于此书的批校极为重视，称此批校本“对于地理古籍批校尤多，还辑录了许多佚文，十分珍贵”。于是我萌发了整理研究此批校本的念头，并于2012年以“清王颂蔚批校本《隋经籍志考证》整理与研究”申报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重点科研项目，此后得到各位评审专家的厚爱，此项目获得立项资助。

此项目我最初申报时，只打算对王颂蔚批校本《隋经籍志考证》做点校整理，然后在撰写一两篇研究小文附于书后，名为“整理与研究”，可是真正做起来了，却感到这种计划实在有些欠缺，对于“整理与研究”之名来说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在仔细阅读此书，并初步点校一遍后，觉得书中有许多问题值得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分析。而且自清乾嘉以来有关《隋书·经籍志》研究的著作颇多，甚至还有日本人兴膳宏、川合康三《隋书经籍志详考》，这就引起了我对此书深入研究的兴趣。

这部著述的篇章架构分为内篇、外篇、补篇三部分，首先是针对此书本身做了些研究并撰写了五六篇论文作为内篇，随即又将此书与姚振宗、兴膳宏、张鹏一、汪之昌有关的《隋书·经籍志》的增补研究著述加以比较分析并成文数篇作为外篇。令人遗憾的是清代名儒章学诚《隋书经籍志考证》一书不知下落，故无法将此二章之书加以比较分析。最后再加上订正光绪刊本《隋经籍志考证》及王颂蔚批校所出现的讹误以作为全书的补篇，最终完成这部有关王颂蔚批校本《隋经籍志考证》的研究著述。

是为序，我诚挚地期待着学术界师友们对这本著作的批评指正。

## 绪 言

自《汉书·艺文志》以后，《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皆无《艺文志》或《经籍志》，直至唐太宗命长孙无忌主持修撰《五代史志》（即《隋书》）才恢复了这一修史的优良传统。而不论《艺文志》还是《经籍志》，都是对一个朝代或一个历史时期学术史的总结。因此《隋书·经籍志》也正是自东汉以来近六百年学术史的总结，这一历史时期目录之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正如《隋志》所云：“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将史籍从经部中分离出来，基本形成了目录学的四部。故此《隋书·经籍志》在正史的《艺文志》《经籍志》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被看成不朽之作。也正是因为此志在学术史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清代以来，考补疏证《隋书·经籍志》者有多家，这在后人对正史《艺文志》《经籍志》的增补考证著述中实属罕见。其中有章学诚《隋书经籍志考证》、章宗源《隋经籍志考证》、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汪之昌《隋书经籍志校补》等有关《隋书·经籍志》的著述，并且大多流传至今。<sup>①</sup>此外还有20世纪90年代日本学者兴膳宏、川合康三《隋书经籍志详考》，由汲古书院于1995年出版。在这些有关《隋书·经籍志》的著述中余以为章宗源《隋经籍志考证》是最有影响的考证著述之一。

---

<sup>①</sup> 案：据《二十五史艺文志经籍志考补萃编》主编山东大学王承略、刘心明两位教授所言，章学诚《隋书经籍志考证》一书他们遍寻不见，怀疑不存于世。余亦以为如此。

《隋经籍志考证》的修撰者章宗源，《清史稿》有传。他字逢之，浙江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人。据孙星衍所撰《章宗源传》云：因其兄章宗瀛在京师任翰林院编修之缘故，他以大兴（今北京市大兴区）籍参加科举考试，乾隆五十一年（1786）中举。后因妖僧明心案受牵连被贬斥，嘉庆五年（1800）卒于京师寓所。章氏少聪颖，学识渊博，“不喜好作时文，以对策博赡”。除撰有《隋经籍志考证》外，还有杂文若干卷。中举后更加好学，“积十馀年，采获经史群籍传注，辑录唐宋以来亡佚古书，盈数笈。自言欲撰《隋书经籍志考证》”。章宗源自云撰写《隋经籍志考证》“辑录已佚之书、不录见存诸书，订正异同文字”，<sup>①</sup>可称是其积十馀年之力所成之作。但是此书撰成后章宗源秘不示人，少为人所知，全书又被恶人所毁，仅残存史部。<sup>②</sup>钱衍石从何梦华处抄得此书史部，嘉庆二十三年（1818），钱衍石将此书自京师带回甘泉（今属浙江嘉兴）家中，其弟清代学者、藏书家钱泰吉闻之借得，请人抄录副本。直至光绪三年（1877）才由湖北崇文书局刊刻，计十三卷，此书始行于世。

而仅就《隋经籍志考证》残存的史部来看，章宗源确实用功颇多，考证颇为谨细。考订《隋书·经籍志》中所著录的著述的源流，如，有关《通史》的考证云：“《梁书·武帝纪》：帝造《通史》，躬制赞序，凡六百卷。《文学·吴均传》：寻有敕召见，使撰《通史》，起三皇，讫齐代，均草本纪、世家功已毕，列传未就。卒。《史通·内篇》曰：梁武敕其群臣，上自太初，下终齐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书自秦以上，皆以《史记》为本，而别采他说，以广异闻。至两汉以还，则全录当时纪传，而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又吴、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跋氏列于《夷狄传》。大抵其体皆如《史记》，其所为异者，惟无表而已。”<sup>③</sup>又将《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中的著录卷数、分类中的讹误一一指出，如，孙盛所撰《魏氏春秋》，“《唐志》作《魏武春秋》，‘武’字，误”。<sup>④</sup>檀道鸾所撰《续晋阳秋》二十卷，“《旧唐志》作《注晋阳春秋》，‘注’当作‘续’，‘春’字误增。

① 见孙星衍《孙渊如诗文集·五松园文稿》卷一，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26—27页。

② 同上。

③ 见《隋经籍志考证》卷一。

④ 见《隋经籍志考证》卷二。

《新志》作《晋阳秋》，脱‘续’字，卷同”。<sup>①</sup>

可是由于此书刊刻较晚，诸如此类问题很少引起学者的足够认识，仅有李庆《关于〈隋书经籍志考证〉的三个问题》，对于该书的成书、类目次第以及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是否窃取章宗源成果诸问题做了分析。并认为《隋经籍志考证》一书仅完成史部，而其他部分根本就没有做。<sup>②</sup> 还有刘洪全《姚振宗与〈隋书经籍志考证〉》，在论述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一书的同时，对于同为《隋书·经籍志》著录考证著述的章宗源《隋经籍志考证》略有涉及，并认为章书不如姚书。<sup>③</sup> 戴维民《读〈隋书·经籍志〉的良师益友——介绍两部〈隋志〉考证著作》也略加叙述了章书，并指出“尽管褒贬不一，《章考》仍不失为一部读《隋志》的较好的参考著作，正如梁启超在《图书大辞典部》所称，《章考》是‘研究古史学之一良著。’在《姚考》之前，还没有一部考证著作超过它。而《姚考》的问世无论是在学术价值、还是参考价值和完整性上又远远超过了《章考》，较之《章考》更值得一读”。<sup>④</sup> 因此可以说此书是研究《隋志》的学者不可不读的一部著作，确为读《隋志》者之真正良师益友也！可是戴氏《姚振宗目录学研究》在论述姚振宗在目录学方面的贡献的同时，却认为“姚振宗撰《隋志考证》名虽同章氏书，但体例则异”。章书“只有史部，至多只是一部《史籍考》”。也就是说章书不如姚书。<sup>⑤</sup>

和章宗源《隋经籍志考证》几乎同时成书的还有章学诚《隋书经籍志考证》，可惜已不知下落。《隋经籍志考证》成书后有关《隋书·经籍志》的论著中，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五十二卷，有独特的心得和见解，并且卷帙最繁，历时最久，功力最勤，成就最大，深为后人赞赏。日本学者兴膳宏、川合康三《隋书经籍志详考》，首先是对总序与各类小

① 见《隋经籍志考证》卷二。

② 见李庆《关于〈隋书经籍志考证〉的三个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6期。另外，据光绪刊本，章宗源的这部著述名为《隋经籍志考证》，非《隋书经籍志考证》。

③ 刘洪全：《姚振宗与〈隋书经籍志考证〉》，《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

④ 戴维民：《读〈隋书·经籍志〉的良师益友——介绍两部〈隋书〉考证著作》，《宁夏图书馆通讯》1985年第2期。

⑤ 戴维民：《姚振宗目录学研究》，《四川图书馆学报》1985年第6期。



序的翻译，其次是对序文与小序的注释，再次是对所登录的书目、作者及小注的补注。此书对《隋志》典籍流传进行研究，有助于对汉隋之间的学术在唐代以后的遗存与流失的考察。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则当是在前人有关《隋书·经籍志》考证研究的基础之上，利用《魏书》《周书》《北齐书》《隋书》《北史》等正史中的史料增补著录五十五部，这实属不易。而汪之昌《隋书经籍志校补》又增补著录的史籍共有六十六部，可是此书的考证文字过于简略，特别是将一些并未完成的史籍一并著录，此种做法实不可取。

今人对《隋书·经籍志》其他考证著述也有所论及，其中多是针对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的研究，如，丁延峰《姚振宗与〈隋书经籍志考证〉辨误三则》，主要考述：“姚振宗的《〈隋书·经籍志〉考证》是迄今为止对《隋书·经籍志》研究最为详尽的著作。其书旁征博引，上下贯通，解决了《隋志》中的诸多疑难问题。但由于篇幅浩大，疏忽之处难免，笔者于研究个案之际，偶检三误，现予考辨。”并指出“姚振宗曰：‘别详《史部·簿录篇》，《志》中所注称梁武帝、简文帝、梁元帝之谥，必非《七录》本文，自是后人追改。’”是姚书的失误之一。<sup>①</sup>伍媛媛《试论〈隋书经籍志考证〉中的“类中分类”》，认为《隋书·经籍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四部分类书目，但《隋志》分类也有编次不当之处，于是姚振宗在其《〈隋书·经籍志〉考证》中对《隋志》进行了“类中分类”。文章从“类中分类”的缘起、特点及意义等方面对姚振宗的分类法做一初步的探讨。<sup>②</sup>余庆蓉《姚振宗目录学研究补述》，以为：“姚振宗备引各家论说对《七略》《汉·志》《隋·志》、四部源流等都有深入研究。”他还考订了《别录》《七略》《汉书·经籍志》以及此后辑佚书之间的关系。<sup>③</sup>王余光《清以来史志书目补辑研究》，指出：“梁启超说：‘至搜罗之博，则此两时代之著作，殆已全收无遗。清代补志之业，此其最精勤足称者矣。’而《隋书经籍志》考证，则最为渊博，是姚氏目录学著作中，用力最勤，考证最精之作。”还认为：“唐、清两代的艺文

① 丁延峰：《姚振宗与〈隋书经籍志考证〉辨误三则》，《四川图书馆学报》2005年第5期。

② 伍媛媛：《试论〈隋书经籍志考证〉中的“类中分类”》，《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08年第2期。

③ 余庆蓉：《姚振宗目录学研究补述》，《图书馆》1989年第4期。

志并不完善，在此之前尚无人辑补；而《历代经籍志》所选也不如人意，如张鹏一的《隋书经籍志补》就不如姚振宗的《隋书经籍志考证》精善。”<sup>①</sup> 孙振田《姚振宗对章学诚目录学的继承与发展》，以为：“清末目录学大家姚振宗对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理论身体力行、大力实践，又对之作了修正与发展；对章学诚‘互著’与‘别裁’说的态度富有辩证色彩；对《校讎通义》中疏失未周之处也多所考论。”<sup>②</sup> 赵伟达、李文学《“目录学大宗”姚振宗》，认为：“清代章宗源积十年辑唐宋以来亡佚古书编成《隋书经籍志考证》，而后毁于仇家，于是重作《隋书经籍志考证》52卷，虽与章书名同，然则体殊，谓为‘多心得之言，为前人所未发。’”<sup>③</sup> 施葵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探析》，对于姚振宗的《隋书经籍志考证》的成书、体例、考证内容以及此书所体现的目录学思想等问题加以分析。<sup>④</sup> 此外，葛兆光《评兴膳宏、川合康三〈隋书·经籍志详考〉》对该书进行了客观具体的评价，他认为《详考》不同于章、姚的《隋书经籍志考证》，前者侧重于对《隋志》所著录典籍本身的研究，后者侧重于对《隋志》典籍流传的研究，有助于对汉隋之间的学术在唐代以后的遗存与流失的考察。《隋书·经籍志详考》主要包括三个部分：总序和各类小序的翻译，序文和小序的注释以及对所登录的书目、作者及小注的补注，这其中最重要也最见功力的是第二部分。《隋志》的总序是对中国古代典籍的聚散和学术的兴衰做的总体叙述，而小序则是经史子集无所不包，为其做注十分困难，但《隋书·经籍志详考》一书在注释方面做得十分出色，引用了大量典籍文献，在佛道典籍的注释方面也非常全面。第三部分的补注方面，作者在考证书籍和作者之外，还将《隋志》著录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对照，以反映汉隋之间的学术文化在日本的影响，并将《隋志》之后的图书目录如《旧唐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对本书的著录附注于下，以考见汉隋学术文化在后世的流传，还附以“辑本”一目，参考《玉函山房辑佚书》等大型辑佚资

① 王余光：《清以来史志书目补辑研究》，《图书馆学研究》2002年第3期。

② 孙振田：《姚振宗对章学诚目录学的继承与发展》，《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7年第12期。

③ 赵伟达、李文学：《“目录学大宗”姚振宗》，《绍兴文理学院学报》（教育教学研究版）2008年第1期。

④ 施葵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探析》，硕士学位论文，湖北大学，2010年。

料，将已经散佚的书在后世辑佚的情况向读者交代，方便查阅。他还指出《详考》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附注部分没有引用敦煌文书。<sup>①</sup> 杜云虹的博士论文《〈隋书·经籍志〉研究》的绪论部分对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做了简单评述：该书沿用了《隋志》的四部分类体系，对所补之书各依其类分别著录书名、著者、所据出处，对部分书籍的内容、学术源流有所考辨。与《隋志》不同的是，对著者的著录略去其官衔、身份，而代之以著者籍贯，这种做法为后人研究地方文献提供了线索。<sup>②</sup> 庄婷婷《〈隋书·经籍志〉和〈隋书·经籍志补〉体例和著录方式的比较研究》将《隋志》与《隋志补》的体例与著录方式做了比较研究，认为《隋志补》继承了《隋志》的体例和著录方式，基本延续了经史子集四部分法和按书名、卷数和作者的顺序著录图书的方式，所不同的是，《隋志补》标注作者的朝代和籍贯，《隋志》标注作者的朝代和官职。由于《隋志补》中并没有《隋志》中的众多叙录，因此《隋志补》在学术上的价值远远不及《隋志》。但其在前人的基础上，尽可能增补了缺失的内容，并对所补内容进行了考据，进一步完善了《隋志》，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这两者都是研究古代目录和目录学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在我国目录学史上起着巨大的作用。<sup>③</sup> 不过这些论文中除葛兆光对于章书、姚书以及《详考》略加比较介绍外，都没有专门将各书加以比较，更没有将章宗源《隋经籍志考证》与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兴膳宏和川合康三《隋书经籍志详考》、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汪之昌《隋书经籍志校补》加以比较研究。

近年笔者由于承担了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整理《隋经籍志考证》王颂蔚批校本，因此仔细阅读了此书，以为有关此书增删《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史籍、对于《隋志》的贡献，以及该书与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兴膳宏等《隋书经籍志详考》、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汪之昌《隋书经籍志校补》等其他各家有关《隋书·经籍志》考证补遗的著述相比较等问题有必要略加考述，以辨其得失短长，究其缘由，进而将此书与其他有关《隋书·经籍志》的考证增补著述加以比较研究。有感于前人

① 葛兆光：《评兴膳宏、川合康三〈隋书·经籍志详考〉》，《唐研究》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36—541页。

② 杜云虹：《〈隋书·经籍志〉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2年。

③ 庄婷婷：《〈隋书·经籍志〉和〈隋书·经籍志补〉体例和著录方式的比较研究》，《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增刊第2期。

---

治史之经验，将这些考述分为内、外两篇。此外，再将此书及王颂蔚批校中出现的错误一一指出，以便读者阅读利用此书及王颂蔚校语，故将这部分考证文字附在全书最末作为补篇。祈请各位前辈、学者不吝指正。



# 目 录

绪言 .....	(1)
内篇 .....	(1)
一 《隋经籍志考证》是否仅完成史部的问题 .....	(1)
二 《隋经籍志考证》所增补书之考述 .....	(4)
三 章宗源删书考述 .....	(117)
四 章宗源《隋经籍志考证》之得失 .....	(139)
五 王颂蔚批校《隋经籍志考证》考述 .....	(166)
外篇 .....	(191)
一 与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之比较 .....	(191)
二 与《隋书经籍志详考》之比较 .....	(275)
三 与《隋书经籍志补》之比较 .....	(343)
四 与《隋书经籍志校补》之比较 .....	(355)
补篇 .....	(375)
讹讹 .....	(375)
结语 .....	(425)
主要参考文献 .....	(430)
后记 .....	(433)

## 内 篇

有关《隋经籍志考证》一书的学术价值，自清末由湖北崇文书局刊刻以来学术界颇有说法，那么这部出自清代乾嘉时期江南学者考证《隋书·经籍志》之作到底如何？这里首先就该书本身及王颂蔚的批校略作探讨。下面就《隋经籍志考证》是否仅完成史部、所增补书、所删书、此书之得失以及王颂蔚批校对于此书的贡献等诸问题做些考述。

### 一 《隋经籍志考证》是否仅完成史部的问题

有关《隋经籍志考证》是全部完成，还是仅完成史部这一部分的问题，学者颇有说法。其中20世纪80年代复旦大学的李庆对该书的成书、类目次第以及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是否窃取章宗源成果诸问题做了分析，他认为：此书仅完成史部，其他各部章宗源并没有做。<sup>①</sup>但是笔者近年承担了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重点科研项目“清王颂蔚批校本《隋经籍志考证》整理及研究”，仔细认真地反复阅读此书，认为实际情况可能与李庆所得出的结论有异，故在此针对章宗源是否全部撰写完成了《隋经籍志考证》的问题略作辨析。

#### (一)

有关《隋经籍志考证》是否全部完成的问题是李庆首先提出的，他认为：“且不说现刊《章考》仅有史部，是否曾撰过《隋志考证》的其余三部尚是疑问，即使退而言之，照某些论者所云，现刊《玉函山房辑佚

---

<sup>①</sup> 李庆：《关于〈隋书经籍志考证〉的三个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6期。另外，据光绪刊本，章宗源的这部著述名为《隋经籍志考证》，非《隋书经籍志考证》。

书》原系章宗源所撰，那么章氏所撰的《隋志考证》也仍不完整，因《玉函山房辑佚书》唯经部较全，子部已是零乱之作，更无集部可言。所以，言章氏曾撰成《隋志考证》之说，实不能成立。”<sup>①</sup>可见李庆认为《隋经籍志考证》并未撰成的主要依据就是《玉函山房辑佚书》，而且是依据“《玉函山房辑佚书》原系章宗源所撰”之说，但是李庆又在文章的第三部分的结论最后又断言“《玉函山房辑佚书》不可能是马国翰剽窃章宗源之作”。<sup>②</sup>既然自己都认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不可能是剽窃章宗源之作，那么依据《玉函山房辑佚书》不全来论定章宗源《隋经籍志考证》其他三部分并未完成，这个论据本身就存在很大问题，也是不可靠的。

## (二)

而史籍及当时学者的一些记载亦可做出反证，据《清史稿》卷四八五《文苑·章学诚附章宗源传》所云：

章宗源，字逢之。乾隆五十一年大兴籍举人，其祖籍亦浙江也。尝辑录唐、宋以来亡佚古书，欲撰《隋书经籍志考证》，积十馀年始成。稿为仇家所焚，仅存史部五卷。

可是现存光绪三年崇文书局刊本却有十三卷，而据《隋经籍志考证》的光绪刊本及其分类来看，确实如此。至于为何出现卷数的差异，当是《清史稿》撰者之误。不过无论怎么说，《隋经籍志考证》确实曾被人为毁坏，现今仅有史部保存了下来。另外据孙星衍《五松园文集》所收的《章宗源传》所云：

大吏某曾倚上官势，属予去其文，不得。得宗源书，戏云：“君以生平辑录书付我，我即去此文，君必秘爱不忍割，是色空之说不足恃也。”

① 见李庆《关于〈隋书经籍志考证〉的三个问题》。

② 同上。

由此可见，章氏所撰《隋经籍志考证》当是此大吏为泄私愤所毁，至于孙星衍为何没有明言此书为其所毁一事，恐为慑于其淫威。

另外孙星衍《章宗源传》又云：

自言欲撰《隋书经籍志考证》，书成后，此皆糟粕，可鬻之。然编次成帙，悉枕中秘本也。又言：辑书虽不由性灵，而学问日以进。吾为此事久之，亦能为古文，为骈体文矣。又以今世所存古书版本多经宋明人删改，尝恨曩时辑录已佚之书、不录见存诸书，订正异同文字，当补成之。其已佚各书编次成帙，皆为之叙通，知作者体例曲折，词旨明畅。

从章氏当时的得意神态来看，这部《隋经籍志考证》也不可能是一部并未完成的著述。而且在《清史稿·文苑传》中将这部《隋书·经籍志》考证之作与章学诚《隋书经籍志考证》并列，因此可以推测章宗源是撰写完成《隋经籍志考证》一书的，只是后来被毁，仅存史部而已。这类事情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之中，是屡见不鲜的。

### (三)

李庆虽然提出章氏《隋经籍志考证》一书仅完成史部的看法，可是在章书的考证文字中又有一些史籍见于经、子、集各部类，还有见于两《唐志》著录的子部、集部的史籍，其中还说明某部史籍见于哪一部的哪一类。既然章氏注意到这些史籍在《隋志》及两《唐志》中又见于除去史部以外的其他部类，凭着他“采获经史群籍传注，辑录唐宋以来亡佚古书”的治学精神，他也不会轻易放弃对经、子、集这三部类的著录考证。另外根据《清史稿·章宗源传》以及孙星衍《章宗源传》，章氏也不是在撰写中猝死，而是完成此书后又过了若干年才于嘉庆五年去世的。因此说《隋经籍志考证》当是全部完成了。

另据《清史稿》卷四八一《儒林·孙星衍传》：“乾隆五十二年，以一甲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三通馆校理。”“[嘉庆]二十三年，卒，年六十六。”而嘉庆二十三年即是1818年，据此推算，孙星衍生于1753年，即乾隆十八年。再则章宗源是乾隆五十一年中举，与孙星衍考中进士的时间仅有一年之差，因此说孙星衍与章宗源大致是同时期的人，又从孙星衍



为章宗源这个地位比他低、名声也不如他的学者撰写传记来看，二人当是过从较密，所以孙氏当曾见过《隋经籍志考证》，故云“至于宗源则无书不具焉”。<sup>①</sup>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此书并非仅完成史部，而是全部完成，只是现在仅存史部而已。

因此李庆虽然提出章宗源《隋经籍志考证》一书仅完成史部的看法，可是他的论据又不充分，他自己又否定了《玉函山房辑佚书》与《隋经籍志考证》有关联，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他的结论。而且《清史稿·章宗源传》以及孙星衍所撰《章宗源传》皆云《隋经籍志考证》曾被毁。特别是《清史稿·章宗源传》还明言“仅存史部五卷”。目前在没有更有力的证据说明章氏仅完成史部的前提下，也只能说章书并非只完成了史部，只是现在仅存史部而已。

## 二 《隋经籍志考证》所增补书之考述

有关《隋经籍志考证》对于《隋书·经籍志》史部所著录的典籍有无增删的问题，只需将此书与《隋书·经籍志》加以比对，便发现此书增补著录的史籍甚多，而且增补著录这些史籍所依据的典籍涉及经史子集的诸多类目，故在此针对增补书籍及其所依据典籍的缘由做一考述。

### (一)

将《隋经籍志考证》《隋书·经籍志》著录史籍加以比较，《隋经籍志考证》增补著录史籍总数达六百二十六部，虽然少于《隋志》史部所著录的八百八十二部典籍数，可是如果两两相加则远超《隋志》史部本来所著录典籍。另外《隋书·经籍志》之后便有署名后晋刘昫所修撰的《旧唐书》及由北宋大文人欧阳修、宋祁等人所撰写的《新唐书》，分别有《经籍志》《艺文志》，其中对唐代及之前的著述做了比较具体的著录，因此考证《隋书·经籍志》不能不依靠这两部史志，而《隋经籍志考证》有关两《唐志》征引颇多，据卷一所云：

<sup>①</sup> 见孙星衍《孙渊如诗文集·五松园文稿》卷一，第26—27页。